

程中才能遇到道德价值判断的真实“困难和疑问”，而解决这些困难和疑问的过程，为高校价值观教育提供了真实的情境和有效的培养方法，所以亚里士多德也认为“道德是一种在行为中形成正确选择的习惯”^[13]。

我国目前的高校价值观教育尚未建立从做中学的教育平台，道德价值判断的教育方法则更为少见，大学生最需要的指导缺失了。仅从教材而言，主要是依托《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马克思基本原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中国近代史纲要》、《形势与政策》为介质的政治价值观教育教材；在方法上主要运用讲授式，缺乏道德价值判断的教育，尤其缺乏道德两难判断教育方法。大学生不能在课堂中体验到两难判断的冲击力，也无法提高价值判断水平。所以，课堂教学中可以更多地运用一对一辩论、小组讨论、两难情境模拟表演等方式讲授；教材中则可多体现生活情境中的道德两难冲突，让大学生从教材和教法中都能够体验到价值判断的困难和魅力，启发他们自我思考，提升道德认知能力。

（三）借鉴的力量：高校价值观教育的文化勇气

当下正值多元文化强势崛起之时，它也促使文化因子在世界各国、民族之间频繁交流互动。任何国家希冀对此视而不见，在与世隔绝的文化真空环境下完成自我文化生产都是一厢情愿的乌托邦。对朝气蓬勃的大学生而言更是如此。他们对放眼看世界的欲望是如此强烈，网络资讯科技发展又是如此神速，大学生手指轻轻一点就可以完成世界的“遨游”。此情此景下，高校价值观教育是挑战与机遇并存。可以通过多元文化的交流积极借鉴他国长处，弥补自我不足。它既是对当下高校价值观教育的努力回应，也不失为一种自信的文化勇气。

社会学家格里芬说：“中国可以通过了解西方世界所做错的事，避免现代化带来的破坏性影响。”^[14]多元文化时代为我们的价值观教育提供了一个了解他国经验教训的良好契机，因为多元文化本身就是一个动态多元开放的系统，高校价值观教育的理念、内容、方法、成果、师资等因素在国际间交往和流动，在比较中体现优势，暴露劣势，我们完全可以秉持批判中继承，反思中吸收的态度借鉴他国的可取之处，用以改进、提升自我的教育。纵观历史，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生成过程就是与多元文化接触、砥砺、革新的过程，并不缺乏向异质文化借鉴的勇

气和智慧。比如说，早在隋唐时期，自印度大陆传入我国的佛教很快在相互借鉴的基础上与儒学和道教完成了本土化的融合，成为我国的主要宗教。时至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早期现代化学制“癸卯学制”，就是在借鉴美国以及学习日本、德国基础上修订而成的。新中国成立后的教育则是大量借鉴当时的教育强国原苏联的理念、体制、方法，甚至包括教材，使得孱弱的教育迅速跟上了世界的步伐，纪律精神和集体主义成为主流价值观。与此同时，世界诸国之间也在全球化的交往过程中相互借鉴，积极吸收。如1947年日本的《教育基本法》就是参照美国道德教育的经验建立的，而美国的《国防教育法》则是在比较学习原苏联教育目标、体制和方法的基础上确立的。凡此种种，不胜枚举，但无一例外地说明在多元文化的生态环境中积极借鉴吸纳他国的优秀教育成果是自我提升的催化剂，而我国当下的高校价值观教育既拥有开放包容的传统文化基础，又有多元文化的现实交流平台，所以，借鉴他人之长理应成为一种教育选择。

（四）教育主体间的联合：高校价值观教育的模式创新

高校价值观教育的系统性、复杂性、变动性与长期性决定了教育主体应有的多样性，不同主体因其所长发力于一处，又通过主体间的联合形成稳定强大的合力，成为我国道德教育模式的创新方向，助推教育实效性的跃升。长期以来，我国高校价值观教育主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展开，依托高校课堂教学完成，教育主体是高校和教师，至于社会、家庭以及学生的自我教育功能并未被设计进来，教育主体间的联合也未曾实现，造成无形教育资源的极大浪费，制约了价值观教育的隐性力量发展。

由于“学校教育处于社会本位”^[15]，学校必须担负起道德教育和公民训练的使命，而且这种训练的根本在于共享的价值观之中。所以，我国一直以高校作为大学生价值观教育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制度化场所，长期倚重学校道德教育的途径，缺乏与社会、家庭和大学生的和谐互动，致使大学生价值观教育原本不高的实效性在家庭和社会中被消耗。美国品格教育灵魂人物托马斯·利考纳曾指出：“新式价值观教育要取得长久成功，必须依赖学校之外的力量：学校和社区应当共同努力，来满足孩子们的需要，并促成他们的健康发展。”^[16]这道出了教育主体间联合的必要性。在此过程之中，大学生从高